

“断裂”与“重构”:资本转换视角下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

李晓明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以南水北调外迁移民安置区“平凡的”SW 新村为例探索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研究发现资本转换路径通畅与否是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搬迁之初移民群体次生贫困和介入性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是由生计交换子系统脆弱性与生计断裂共存以致移民群体资本转换路径受阻引起。SW 新村以 8 年时间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同样在于多方努力下资本转换路径的重构:通过自然交换升级打破传统农业路径依赖;政府提供市场转换条件实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得以向物质资本转换;社会交换挖掘移民传统文化中优势文化资本清除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障碍;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良性循环。

关键词:水库移民;精准脱贫;资本转换;断裂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D631.3;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7)05-0013-07

一、引 言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国务院扶贫办 2014 年 6 月颁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从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对我国整体扶贫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更有效指导推进全国扶贫工作^[1]。而在多种分类的贫困群体中,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水库移民群体贫困问题更难以处理,与其他群体原生贫困相比,移民群体介入型贫困和次生贫困问题突出^[2];而社会空间转换下移民群体在安置区多维度资本要素禀赋相对存量与增量之阙如又意涵其精准脱贫之路羁绊重重^[3]。据统计,目前我国水库移民群体贫困人口数量高达 370 万,贫困发生率高达 15.4%^[4],明显高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八省区和少数民族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发生率(12.2%、7%、10.5%)^[5],比同期全国 3.1%的贫困发生率高出 5 倍有余^①。水库移民精准脱贫不仅关乎为国奉献群体整体福利的改善,更关乎社会公

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问题。

然而,与现实问题相悖,学界目前针对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问题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第一,有关“精准扶贫”或“精准脱贫”相关的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共 336 篇,但是与水库移民相关的仅有孙良顺的 2 篇文章^[6-7]。水库移民群体的精准扶贫问题被遗忘在角落里,与其现实中所遭遇的脱贫困境不符。第二,可借鉴的精准扶贫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扶”的过程,如理论探讨类:技术靶向瞄准理念的提出,科教扶贫提升可行能力理念的提出,从单维到多维嬗变的提出等^[8-10];又如扶贫困境类探讨:项目制运行的困境,精英捕获与大众捕获现象频发,数字下乡技术最终演变为数字悬浮等同样以“扶”为逻辑主线探讨乡土化过程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11-13]。但精准扶贫工作已跨越中期临界点,针对从“扶”到“脱”的过程究竟如何实现的文章较少,脱贫路径阐述不清晰。第三,与“精准脱贫”相关的少数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先进模式”的介绍,如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前提条件要求被扶贫地区先天性具有

收稿日期:2017-06-3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5B40314)

作者简介:李晓明(1986—),男,河南平顶山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农村水库移民精准扶贫研究。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6 年年末总人数 138 271 万人,同时参考新华网《2016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 240 万人》文中 2016 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 4 335 万人共同计算得出。

“青山绿水”^[14];农业科技扶贫成功则要背靠于高校教育资源的定点下乡^[15];项目制运行成功逻辑则产生于精英的承载能力、社会资本和人格魅力等^[16]。然而正如朱天义在《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中总结的那样:精英扶贫模式的成功依赖于先天或特殊优势因素,其他地区很难通过学习、模仿、培训等手段进行简单的成功复制。那么对于那些相对“平凡的”村庄实现最终精准脱贫的演变路径又是什么?第四,现有精准扶贫文献的分析范式可以分为两类:结构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注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作用分析^[17];个体主义范式则聚焦于精准扶贫或精准脱贫过程中贫困个体的可行能力提升^[18]。这两种分析为精准扶贫问题研究提供了“双视角”,但是存在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割裂的问题,对精准扶贫或脱贫的动态性机制关注不足,对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在致贫和脱贫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性阐述不清晰。

笔者以2017年3—5月期间在河南省P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移民安置区的调研资料和访谈笔记为基础,以资本转换视角对相对“平凡的”外迁移民安置村SW新村精准脱贫之路进行深描,记录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的生态足迹,为现阶段水库移民贫困群体的脱贫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资料。

二、生计资本转换视角分析框架的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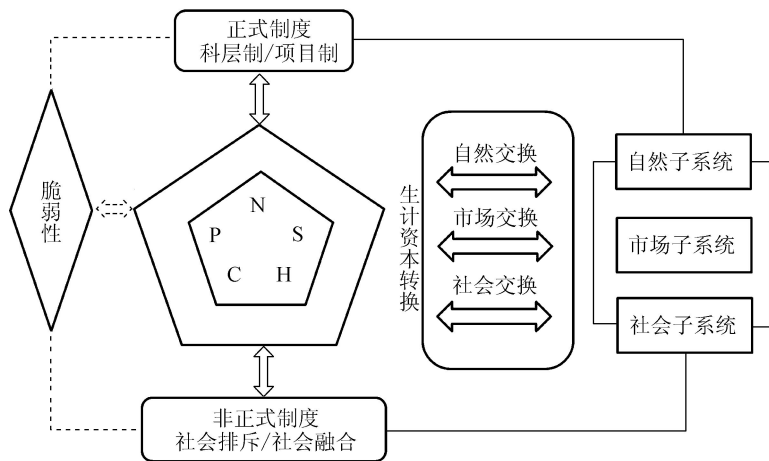
“生计”是与贫困研究相关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英文词典中生计意译为“一种生活方式或手段”^[19]。我国学者对生计定义范围更丰富:职业、工作或收入类型都可以与生计的内涵相通。而目前学界公认的定义可以表述为:生计即个体的谋生手段或方式,而其谋生的基础则是依据自身能力、资产和活动等。

生计资本定义则在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新资本定义之后,资本内涵由传统的设备、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含义拓展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20]。首先,拓展后的定义依然保留“资本”最初的逐利性,但现有研究与生计贫困相关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并未体现出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与可转换性共存特征:不同个体在各自场域中自身拥有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并最终达到个体资本再生产和生计发展的目的^[21]。比如以金钱投入到技能培训或文凭教育活动带来人力资本升级,人力资本升级又可带来收入提升^[22]。因此结合本文研究目的,笔者认为水库移民群体贫困和脱贫问题的

实质可以看作:在嵌入性宏观环境中,贫困个体支付一定成本后,通过资本转换活动增进个体某项资本要素禀赋这一过程是否通畅的问题^[23]。正如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里对饥荒的理解:饥荒与国家整体粮食供给量没有关系,根本原因是由贫困群体交换权利的失败导致^[24]。揭示转换能力才是生计发展的核心环节。其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理论基础源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最终分析框架由英国国际发展部于1998年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25]。该框架提出5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侧重点在于描绘个体如何在外部环境中(脆弱性环境)运用自身生计资本实现发展,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脆弱性环境、制度、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之间的循环关系,并展现制度与生计资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26],连通结构分析范式与个体分析范式。但该分析框架仍存在不足:结构分析范式中分析框架主要探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关注不够,水库移民生计资本转换活动更多嵌入在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如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权力排斥以及文化排斥等非正式制度作用下资本转换路径受阻;个体分析范式中该框架则存在对“经济资本”过于依赖,同时缺少跨时间维度动态分析等缺陷。

笔者构建了“资本转换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1),以达到个体与结构分析范式的有效结合,体现资本不可替代性和可转换性的共存特征,并关注非正式制度与非经济资本作用。具体而言,该框架的运行机理为:第一,框架运行的核心动力为移民群体5种生计资本通过与外界互动不断的良性转换实现各项资本存量的螺旋上升。而此处构建的生计资本结合布迪厄新资本理论、SLA框架和水库移民贫困特征加入文化资本,改善SLA框架过于关注经济资本的缺陷;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分类对于移民村农户来说意义重复,因此融合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统称为物质资本。第二,微观个体生计资本转换主要依靠3种媒介进行转换: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第三,微观个体生计资本转换活动并非孤立的转换,实际转换活动“嵌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子系统的属性之中(此时的制度环境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需要不断与制度环境进行能量交换。制度环境干预可能成为资本转换的桎梏,但由于个体能动性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同样可以“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的良性循环。

SW移民新村位于河南省中部P市JX县,原居



P—物质资本 C—文化资本 H—人力资本 S—社会资本 N—自然资本

图1 生计资本转换视角分析框架

住地位于河南省 NY 市 XC 县,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外迁第一批移民。在安置方式上 SW 新村移民属集中外迁安置:与分散型安置和后靠安置相比集中外迁安置可解决内部融合和后靠安置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但强制性远距离外迁安置则更易引致介入性贫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断裂以及多条资本转换路径受阻等问题;且相对于分散安置的“个别问题”,远距离集中安置更易引发群体性权力排斥、贫困、道德虚化或边缘化等问题。新行政村由原先 MW、WG、MG、CZ 4 个自然村中外迁移民合并而成,共 10 个村小组,390 户 1 699 人,分别于 2010 年 8 月和 2011 年 9 月两次搬迁完成。从地理位置上来看,SW 新村位于 JX 县城西北部,距县城约 4 km,交通方便。人均耕地仅有 0.069 hm²,均为旱地。目前全村人均收入约 11 200 元,基本全部脱贫。而且从整体结构来看,外出务工收入占 33%,农业收入占 10%,经济作物种植业收入占 30%,财产性收入(集体分红)占 20%,其他(如转移性收入)占 7%,收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且以采摘园区和小型新型建材厂为主集体经济年产值达 1 000 万以上,不但成为移民安置区中的示范代表村,也成为最新一批“河南省 2016 年移民乡村旅游试点村”。然而笔者在 2017 年 3—5 月期间于 SW 新村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村干部和村民看来由最初搬迁至此无任何优势资源、平均收入仅 4 100 元且贫困人口接近 25%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经过 8 年时间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笔者将在以下两节中通过调研期间搜集的基础资料、问卷资料以及访谈记录,以资本转换视角分析框架深描 SW 新村水库移民由“多维贫困”到“精准脱贫”是如何“脱胎换骨”,以期对其他农村地区和水库移民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些可靠的现实依据和对策建议。

三、搬迁之初:“生计断裂”

1. 交换子系统脆弱

生计资本的“嵌入性”决定其转换效率,甚至转换结果的成败都要依赖于交换子系统的外部环境。并且交换活动要遵循子系统结构层次的构建因素,如自然交换活动要嵌入于自然系统自身属性的规则和制约:土壤、阳光、温度等直接影响着交换互动过程和结果。而 SW 新村水库移民在搬迁之初,在子系统外部环境上无任何优势。首先,自然交换子系统脆弱性凸显。这里的脆弱性既有地理因素也有结构因素,P 市地处农业人口大省河南省的中部地区,2009 年第二次河南省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08 hm²,且中部 4 市属后备土地资源枯竭地区(P 市赫然在列),在这样的宏观地理因素限制下,调配土地面积仅为人均 0.069 hm²(已是在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其次,从土地质量上来看,调配给移民的土地是本地人农业发展千百次种田实验下的边角料、劣质田,无法与移民口中原先水田的质量相比较;再次,市场子系统容纳量逐渐萎缩,在刚搬迁来的前几年,移民处于调整期,与市场子系统进行交流的活动不多。而在 2012 年我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这一点在我国普通县域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土地财政”热浪过后,并无其他劳动力承接点^[27]。伴随着我国近期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可承接大量劳动力行业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进一步萎缩,用 SW 新村 L 书记的话说就是“反正我们来了之后等想去县城打工的时候,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活可以干了。”最后,“移植”活动带来的社会子系统排斥反应。若把安置区的社会子系统环境看作一个“主体”,那么 SW 村这个“器官”原本则属于另一个“主体”,其相

互作用过程因移植手术而发生,但是这两个“主体”原本生活的环境、汲取的营养、流淌的血液均不相同。这个新“器官”的神经网络与安置区神经网络重新对接过程中必定出现排斥和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在共同努力下可能被消除,也可能会更排斥。

2. 生计断裂:“多维贫困”

生计资本是资本转换活动的基础,有学者提出资本转换过程是以自身某类资本的“优势”去弥补其他资本类型不足的行为方式。也有学者提出,资本存量对于整个资本转换过程的效率起到决定性影响,因为在某类资本存量较高的情况下,该个体会过滤掉一些无效率的转换模式。而在搬迁之初对于移民个体来说,其生计状态是断裂的、多项资本存量是匮乏的,转换路径是受阻的。

第一,自然资本贫困。自然资本本意是指与自然相关的土地、水、空气和矿产资源等。本文中的自然资本指的是农户与大自然接触过程中由大自然提供并可用于维持生计的资本,如耕地资源、林地资源、水资源,用于补贴日常生活的林下经济(菌类、薪柴类);又如利用农村自然环境可进行的院落经济等。而水库移民原先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本在搬迁之初基本全部丧失,如上文所述的耕地资源、原先邻近水面可获取的水产资源以及原先在老家可以利用“环境优势”进行的庭院养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田园经济等。我们不能小看这些田园经济,往往可以不用考虑市场价格解决生活中一家人的肉禽蛋奶问题。更重要的是移民在搬迁后从土地上的收成并不能给家人带来“体面的生活”,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变差而劳作成本却在上升。面对生计并无他法,家底殷实的家庭尚可依靠“存粮”度日,而大部分移民由以前从未感知贫困是何物陷入由自然资本贫困带来的焦虑之中。

第二,物质资本贫困。物质资本本意为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本文与水库移民相关的物质资本指的是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家庭资产以及基础设施。需要区分的是公共型物质资本和家庭型物质资本,由于安置区建设属命令式建设计划,仅关注公共物质资本可能掩盖“富庙里的穷和尚”现象。SW 新村迁入之初,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相对于搬迁之前得到了很大程度改善。通过与多数移民深度访谈,搬迁初期与外表相对的是移民家庭型物质资本十分有限,贫困户更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其原因有三:其一,移民迁出地仍属费老书中的传统乡土社会^①,相对于鲍德里亚所述的消费社会,乡土社会物

质资本不足是其特征之一,但这种特征在搬迁初期与外界近在咫尺的“消费社会”对比下,家庭型物质资本匮乏被扩大数倍。其二,移民在迁出地时,国家90年代初期就对丹江口水库库区下达封库令,但最终移民搬迁是在2011年完成,前后相差近20年^②,库区搬迁区域这20年间发展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移民群体缺乏发展动力,无力对家庭型物质资本投资,而这项不足在进行补偿时却并未纳入。其三,在搬迁之初,由于生计交换子系统和自然资本“双重限制”下并无重新投资家庭物质资本的能力。

第三,人力资本贫困。早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人力资本在“可行能力”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得到验证。而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贫困与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难以形成生计发展或脱贫动力还略有不同:其一,农村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本质还属于人力资本结构中的“弱质”型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特别是正规教育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调研数据分析,至今SW村移民正规教育年限与邻近村正规教育年限仍相差约1.3年^③。依据经济学中的收敛效应反推之,搬迁之初这种差距更大,导致移民群体在就近劳动力市场就业出现非制度性排斥效应。其二,作为人力资本中另一个重要方面,非正规教育(如技艺、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在强制—介入型搬迁下导致水库移民群体“人力资本失灵”。其在迁出地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劳作方式、育种、耕作以及田间管理等技能在安置区变得聊无意义,在新“场域”中需以时间和资本对人力资本重新进行投资,而这个“空档期”正是水库移民人力资本的贫困期。

第四,社会资本贫困。“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

①水库移民迁出地在下文所述的封库令限制下,基本保持其乡土性社会20年之久,据新村村民回忆,之前村里基本无人出去打工,虽然存不了什么钱,但没有对比很多时候体会不到什么是“贫困”,但进入到被市场化同化的地区,这种物质资本的脱节加上对比立刻让村民感受到贫困是何物。

②根据《移民条例》第七条:“实物调查工作开始前,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发布通告(习惯称‘封库令’)”,“封库令”一经下达,即“禁止在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对于移民的影响就是,在封库令下达后禁止一切扩大再生产活动,等待清查人员对其财务进行清算,尽管在清算之前还有一段时日移民可以“偷偷”进行一些财产增加行为,但这种活动大多体现在青苗、零星数目的数量,因为这是可以让移民的家庭资产升值。相反移民不会在对家庭资产进行投资,因为移民心里知道家庭型资产投资得再多,最终都是要被拆或者被折价赔偿,属减值投资行为。

③SW新村属于其中的一个调研点,共获取外迁移民户78户问卷,受正规教育年限均值为6.6年,作为对比笔者对邻近村抽取50户对比样本,正规教育年限均值为7.9年。

布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中提出。其在贫困研究中“自救”特点尤为突出,如贫困个体就业“搜寻与匹配”过程中的搜寻环节,创业过程中的小额担保贷款获取等。而对于SW新村水库移民社会资本贫困在搬迁初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断裂中的延续。陈绍军等以“嵌入”视角研究江西水库移民社会系统重建中提出移民社会关系网并未完全断裂,而是“断裂中的延续”^[28]。笔者在调研中进一步发现搬迁之初,正是这种“断裂中的延续”导致移民群体社会资本贫困,自我保护的同时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关系网,“弱关系”社会资本存量阙如:小孩儿上学、出去找工作、找人办事儿等“一抹儿黑”。其二,搬迁初期,空间上的流动并未切断与“根”的联系,一部分强关系保留在迁出地,在老家人眼中移民群体已成为“致富者”,无形中给移民群体增添了许多“额外”责任,使其在搬迁初期本来就贫瘠的生活为了要维持这种“无效”^①社会资本而雪上加霜。

第五,文化资本贫困。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中提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中是‘愚’的,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29]可见,具有自我特质、自我认同以及排斥功能的文化并无对错、贫富之分。但当我们以资本转换视角动态地看待这一问题时,移民文化资本便有了贫困特征。水库移民群体特殊性导致其文化资本随空间转化同样发生着对照坐标系的迁移,搬迁之前移民自身所属文化资本并不影响该群体由本地文化资本为坐标系原点出发的不同转换路径,资本存量也是充足的。但搬迁之后,坐标系转换原则之下,参考原点不能再以迁出地文化为基,与安置区居民的文化资本存量相比,移民群体的新文化资本存量是相对匮乏的。导致其社会适应样态偏离融合、同化而更趋向于分离和边缘化,以安置区文化资本为原点的资本转换路径阻塞,并超出当地政府和社会系统所能调节的范围,最终与安置区生产生活相脱节^②。此外,搬迁初期,SW村移民的脱贫问题不是“不能”的问题,而是“不要”的问题,多数移民在搬迁前期都抱有强烈的为国奉献国家就应该对我全部负责以及“等、靠、要”思想,走进类似非洲扶贫“越扶越贫、越扶越懒”的怪圈,群体性贫困文化特质突出。

四、精准脱贫:“资本转换重构”

时至2017年5月份为止,SW新村建立了包括钓鱼园、葡萄园、黑猪园以及小型免烧砖厂等多种产业,且产业掌控由新村内部主导。全村人均收入约11200元,全村村民基本全部脱贫,成为最新一批“河南省2016年移民乡村旅游试点村”。总体而

言,从昔日断裂式多维贫困到如今示范村、试点村,是由于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移民群体通过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以及与制度环境交换等生计资本交换活动,导致生计资本重构和资本结构优化的这条逻辑主线对SW移民新村的精准脱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自然交换,摆脱路径依赖。自然交换主要是指移民户通过投入生计资本后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突破农业发展瓶颈三大措施中重要一项即改造传统的生产要素^[30],SW新村的自然交换过程同时也是自然资本升级摆脱传统农业路径依赖并向物质资本转换的过程。其自然交换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不破则不立。面对SW新村搬迁之初无休止的上访问题^③,JX县移民局领导通过商议决定不能任凭事态发展不管不问,通过认真研究上访重点问题后发现SW新村自然子系统脆弱性较强,但却有几项天然优势:一是人均土地面积少,但整体性完好、不分散,有农业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基础条件;二是移民不好惹且抱团现象严重,但可减少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三是移民村干部对上访问题也头痛,但他们更倾向于把安置补偿费用中村集体部分拿出为集体经济投资,早日结束无休止的上访。其二,移民局与村干部和移民达成一致后,首先通过移民局协调农业技术人员帮助测量土壤酸碱度及矿物质含量,经测量SW新村的土地状况最适合种植葡萄,随后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大棚建设支持,村集体提供成片土地和动员积极分子支持;其次,村集体土地一部分规划为小型新型建材免烧砖厂,村集体经济投入初始建设启动资金50万,并接受村民以劳动力或者资本形式入股。最后,村集体土地另一部分规划为移民老家优势猪种“师岗猪”黑猪养殖场,养殖场地由政府投资

①无效是为了说明其在搬迁初期,弱关系对水库移民在安置区的生活除了情感上的维系之外,已起不到任何其他作用,远水难以救得近火;另外还体现在移民在搬迁之后回老家的人情费上涨,比如搬迁前亲密关系人情费一般是500元,而在搬迁后亲戚眼中他们都是致富者,人情费因为一次搬迁则上涨到1000元起步,有的更是要2000~3000元。花费更多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反而对其初期贫瘠的生活增添更多负担。

②搬迁之初,政府尝试性的安排过十几个人进入当地SG集团的医疗器械生产单位工作,但是这十几个人仅有1个最后留下工作,其余全部自己辞职,经询问后他们给出的答案很统一很简单:当时受不了每天8小时的坐班制。

③据JX移民局副局长口述“2012年之前,这个移民村完全就是敏感区,我们不敢让领导们、学者们下来调研。并且还挡不住他们去上访,因为家里房顶漏水问题,有几户经常可以上访到市移民局W局长那里。”

建设^①,SW 新村提供老家黑猪品种和村里养殖能手。

第二,市场交换。市场交换主要指移民将劳动产品或劳动力作为参与到市场交换中的商品。SW 新村移民群体通过完善市场交换条件,打通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向物质资本转换的路径。其转换途径主要有以下 4 步:其一,转变企业人员安置策略。由于对前期实验性的企业安置失败经验总结,SW 新村 L 村长认为,主要是由于村里男人普遍保留原有传统乡土社会中“悠闲”和“散漫”的生活习惯,村中女人一直以来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强,忍耐性和适应性也更好,于是调整进驻企业的安置人员由男性群体转变为女性群体为主,从事医疗器械组装计件工。由此排除了由于文化、性别不适应而导致移民群体劳动力参与市场交换的障碍。其二,为从事农业产业发展非积极户提供同样技术培训和指导(如葡萄种植或者黑猪养殖技术培训),为其随时进入市场交换活动提供前期基础。其三,通过政府搭桥打通市场与移民村产品之间的通道。如为黑猪养殖场联系当地著名冷鲜肉制品“绿大夫”公司,砖厂发展前期政府项目采购路面铺砖给予订单支持,为移民村葡萄产品销路提供信息平台等。其四,县移民局在 SW 新村设置互助基金为贫困户提供资金支持平台,降低贫困户由于社会资本贫困无法获取贷款而难以参与市场交换活动的概率。

第三,社会交换。社会交换是指移民家庭通过与他人互动并采取有助于实现资本转换的手段。社会交换活动需要通过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传导媒介向其他资本形式转换并得到收益。SW 新村社会交换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挖掘移民文化中积极部分带动移民群体社会资本转换互动,移民文化并非只有“等、靠、要”“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等贫困文化,其迁出地传统社会还为移民群体保留“诚信、吃苦耐劳、团结、非拜金婚姻观”等积极文化部分。实践中 JX 县移民局干部充当“媒婆”角色推动移民村与安置区其他村庄之间的联姻活动使移民文化积极部分不断得到邻近村庄认同^②,并为移民群体消除文化隔阂和社会网络重构提供动力基础。其二,SW 新村通过举办文化型社会交换活动促进村民社会资本提高,如每年春节前 SW 新村会在其村部食堂举办“丹江鱼宴”并邀请邻村村干部、村民广泛参与,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移民社会资本得到补充,为其获取打工信息、种植技术互动提供平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带动社会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进一步转换,由先前“办事儿一抹儿黑”向“打工有人带、办事儿有人帮”的转变恰好印证这

一点。

第四,制度环境交换。正如前言所述,任何资本转换活动都是“嵌入”在当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资本转换活动良性运行可“倒逼”不利制度环境向有利于目标群体的方向发展。搬迁之初,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移民资本转活动互动都是不利的,如正式科层制与项目制之间的张力会使移民村申请的扶贫项目或后期扶持项目在传递过程中被替换或过滤;如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性排斥”又会让移民村干部为村民跑项目过程中遭受不利竞争并最终被淘汰。但随着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带来移民群体资本转换活动的良性运转,这种“不利环境”又反过来向着有利于移民群体脱贫致富方向发展:2015 年之后约有 10 多个政府部门扶持资源“主动”进驻 SW 新村。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以“资本转换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深描“平凡的”SW 新村水库移民由搬迁之初“面朝黄土背朝天”至“精准脱贫致富”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资本转换活动是移民群体脱胎换骨的重要行动策略和逻辑主线;第二,资本转换过程要通过自然、市场、社会以及嵌入性制度的交换活动实现,这些交换活动带来移民群体生计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如市场交换环境改善不仅可以提升移民的物质资本,同时在移民群体能动性下其社会资本也在不断地提升和优化(如免烧砖长后续发展政府订单的减少但移民自主联系订单量增加);第三,资本转换活动良性循环可以进一步形成移民群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倒逼不利于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朝着有利于其群体利益的方向发展。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与其他外迁移民安置地安置相比最大的感悟。通过移

① SW 新村当时与政府签订协议,黑猪养殖场的土地平整以及多种功能新厂房由 JX 县政府提供资金 50 万元,但养殖场土地所有权在 5 年以后土地 JX 县政府但仍可免费使用归,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相当于即使这项投资在初始的 5 年失败了,县政府投资最起码可以收回土地,移民不必为此承担损失;若成功移民仍可免费使用仅是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

②安置区其他村庄现在深受消费社会拜金价值观影响,男青年娶亲定金最少 5 万(不含“三金”),并要求家中由像样房子更甚者要求县城有房。而与安置区其他村庄相反,SW 新村家庭婚姻观保留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部分,更注重孝道、诚信等道德品质,对于礼金有则最好,无则不强求,只要家里人觉得这个男孩人好就行。目前据村里人统计已有 35 名男女青年与当地人联姻,成为移民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使安置区居民可以从内部了解移民文化中的积极文化。

民群体的资本转换活动整体过程来看,其“草根的逆袭”背后无非是几个微小的因素在最初的生计转换策略和行动上起了重要作用:移民干部无优势资源带动就稍微多思考一点;移民村无优势旅游资源、自然资源村干部的动员工作就做多一点;对移民文化资本多一些了解;与移民互动过程中多一些耐心等。正是这几个初期行动上“稍微”的差别,以8年为一个时间容器,其脱贫成效和后续发展效果被放大数倍,直至笔者调研结束时,P市其余4个外迁安置点仍存在多维贫困和稳定问题,在移民干部口中安置区敏感性问题的没有任何改变。

在探讨嵌入性制度交换的资本转换过程中,大量社会资源和项目资源“主动”投入到新村是在SW新村成为示范村以后,这种投入属于“后发式”精准扶贫资源投入,这个现象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无疑会带来整体性精准扶贫工作的低效率(如SW新村出现基础设施建设过度化现象),对于其他亟须扶贫资源的村庄和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相对剥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对这种低效率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这也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棉管. 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 社会学研究,2017(1):217-241.

[2] 杨云彦,徐映梅,胡静,等.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基于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08(11):89-98.

[3] 盛济川,施国庆. 水库移民贫困原因的经济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8(12):43-46.

[4] 毛立军. 水库移民仍有370余万人未脱贫[N]. 人民政协报,2016-03-21(5).

[5] 顾海娥.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解决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J]. 新视野,2017(2):41-46.

[6] 孙良顺. 发展水库移民社区 助力移民精准脱贫[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25.

[7] 孙良顺.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3):76-80.

[8] 辜胜阻,杨艺贤,李睿. 推进科教扶贫 增强脱贫内生动能[J]. 江淮论坛,2016(4):5-9.

[9] 吴雄周,丁建军. 精准扶贫: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嬗变——兼析湘西州十八洞村扶贫调查[J]. 湖南社会科学,2015(6):162-166.

[10] 左停,杨雨鑫,钟玲. 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 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11] 王雨磊. 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 社会学研究,2016(6):119-142.

[12] 邢成举,赵晓峰. 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J]. 学习与实践,2016(7):116-123.

[13] 许汉泽,李小云.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9-56.

[14] 杨建,韩宗伟,张翊红. 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和推进策略[J]. 云南社会科学,2016(6):52-56.

[15] 万兰芳,向德平. 反贫困中的技术治理机制及效果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定点扶贫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45-148.

[16] 朱天义,高莉娟.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6(5):89-99.

[17] 虞崇胜,唐斌,余扬.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J]. 理论探讨,2016(2):5-9.

[18] 岳映平,贺立龙. 精准扶贫的一个学术史注角:阿马蒂亚·森的贫困观[J]. 经济问题,2016(12):17-20.

[19] 许汉石,乐章.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2012(10):100-105.

[20] 周红云. 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4):46-53.

[21] 叶静怡,周晔馨.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0(10):34-46.

[22] 刘程.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中国青年研究,2012(8):60-64.

[23] 谢家智,王文涛. 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J]. 中国软科学,2016(10):20-36.

[24]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5] 李雪萍,王蒙. 资本转换视角下村庄社会分层及农牧户致贫机理分析——基于GZ藏族自治州农区Y村的实证调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76-81.

[26] 唐丽霞,李小云,左停.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J]. 贵州社会科学,2010(12):4-10.

[27] 陆铭.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8] 陈绍军,田鹏. “嵌入”:移民社会系统重建的新视角——以江西省W水利枢纽工程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2-30.

[2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0]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吴玲)